

梁漱溟思想批判

(論文彙編)

第二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梁 漱 溟 思 想 批 判

(論 文 彙 編)

第 二 輯



生活·讀書·新知
三 聯 書 店

梁漱溟思想批判

(論文彙編)

第二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302·850×1168 $\frac{1}{32}$ ·7 $\frac{3}{4}$ 印張·184,000字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2,000 定價：(7.0).80元

目 次

批判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	湯用彤 任繼愈	3
梁漱溟的“理論”是極端唯心主义的·····	潘梓年	12
向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展开斗争·····	任繼愈	19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的歷史观点·····	吳廷璆	30
批判梁漱溟關於印度文化和哲学的謬論·····	金克木	50
梁漱溟是怎样向馬克思主义進攻的·····	胡慶鈞	67
批判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論·····	吳景超	86
梁漱溟怎样宣傳反动唯心哲学·····	周輔成	106
梁漱溟所謂“理性”是甚么？·····	王若水	123
批判梁漱溟的主觀唯心論哲学思想·····	鍾宇人	138

*

*

*

評一九三〇年梁漱溟和胡適的

“爭論”·····	汪子嵩 朱伯崑	148
梁漱溟的四十年·····	李紫翔	156
批判梁漱溟關於階級斗争問題的反动观点·····	沙 英	169
批判梁漱溟否認階級和階級斗争的反动观点·····	何汝璧	187
揭穿梁漱溟的反动本質·····	何思源	198
梁漱溟的反动理論是为誰服务的？·····	何炳然	210
批判梁漱溟關於中國革命是“从外引發” 的謬論·····	高 放	218

ELSS 10

批判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

湯用彤 任繼愈

“五四”前后，曾經出現了大批的封建复古主义的思想：学衡雜誌反对白話文；康有为叫嚣以孔子为教主；从袁世凱到曹錕、段祺瑞都提倡祀孔和讀經；胡適也在借口“整理國故”引誘青年鑽入故紙堆；歐陽竟無以支那內院作为宣傳佛教唯心主义的基地。这种复古、守旧的邪風正如魯迅先生所攻击的，非把中國变成一个丧生命的大“古董”不止。这一反动的逆流，正是表示在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威力下，垂死的反动思想企圖作最后的反扑。

如果把当时“五四”前后的这一般逆流放在当时全世界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哲学逆流中來考查，就更容易看清楚它的反动作用。

苏联的建立，鼓舞和支持了东方殖民地及附屬國的民族革命运动。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漲直接震撼了帝國主义的大后方。在全世界範圍內帝國主义面臨着經濟蕭条和政治的危机，他們不敢向前看，只有妄想在中古封建主义、宗教迷信中找尋救命的藥方。

当时西方資本主义國家所流行的唯心主义学派都帶有反理性主义的特色。像詹姆士和杜威的实驗主义、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柏格森和倭鐸的生命主义、杜里舒的神秘莫测的“隱德來希”、罗素的“冲动”，加上上世紀的叔本華、尼采的盲目主觀的意志學說，这些唯心主义的毒素思想形成了一股反理性主义的逆流。这些思想傳播到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來，給帝國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國的統治建立理論根据。梁漱溟的反

动哲学就是在全世界反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逆流的影响下，配合了当时国内的复古主义的逆流，来宣扬“孔子精神”和“中国文化”的。

梁漱溟和当时那些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者抱着同样的目的，都企图用所谓“孔子精神”和“中国文化”来加强那腐朽欲断的束缚人民的“四大绳索”（参看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但正如毛主席所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梁漱溟既然为封建主义效忠，对马克思主义仇视，他势必匍匐在帝国主义的脚下，做他们的走卒。我们试检查一下梁漱溟的哲学，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梁漱溟所讲的“孔子精神”和“中国文化”一方面吸取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反理性主义的糟粕，一方面也大量吸取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杜里舒、罗素、倭铿、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反理性主义的毒素，其中柏格森更是主要的。

梁漱溟反动的政治观点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的。他认为：

“宇宙为一大生命；生物进化与人类社会之进化同为此大生命之开展表现”。（“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第369页）

这一神秘的“大生命”，梁漱溟认为也就是人类的“生活”：

“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48页）

照梁漱溟看来，世界是“大生命”，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发展是由文化决定的，文化是由“意欲”决定的，而“意欲”却是这一个“大生命”的表现。这就是说，世界本身、社会本身、以及生物界，都不是客观存在，而只是由于有了“大生命”的存在，它们才存在。

生命派認為世界不是物質的存在，世界的本質只是“大潛力或大要求或大意欲——沒盡的意欲”。他們企圖抹煞物質世界，把物質世界精神化、神秘化。離開人類大腦的活動，居然還有獨立存在的“大要求”、“大意欲”，這對於一個正常的、相信科學的人來說，實在是不可想像的。梁漱溟的世界觀恰恰就是建立在這種不可想像的、神秘的基礎上。

生命主義者提出了沒有物質基礎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大意欲”，並且由此進一步狂妄地否認人所公認的常識。他們硬說，物質對世界發展起着妨害作用。他們經常說物質世界是產生一切“罪惡”“墮落”“停滯”的根源。梁漱溟說，物質世界本身就只能發生“向下的沖動”，為了避免物質世界引起人類的“向下的沖動”，只有讓“盲目的意志沖動”“大意欲”盡量發展，用這種“向上的沖動”來抵制“向下的沖動”。生命主義者要用“精神”來克服“物質”，實際上就是用“生命”“精神”來代替物質。所以他把“生命”和“意欲”說成“‘現在的我’對於‘前此的我’之一種奮鬥努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49頁）。他所謂“現在的我”即是“心”或“精神”，所謂“前此的我”即物質。這一派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敵視唯物主義達到瘋狂的程度。他們和從古以來的僧侶主義者一樣：分明向飢寒的勞動人民進行敲骨取髓的剝削，却叫喊着要輕視物質；他們一刻也離不開貪婪和享樂，經常依附於豪門貴族，却叫喊甚么“出世”。梁漱溟的“鄉農學校”里，一間屋子裡對農民非刑拷打，另一間屋子裡向農民講“萬物一體”和“仁”的最高境界。

問題已很清楚，梁漱溟的生命主義哲學認為有了“大生命”，有了“生活”，才有“宇宙”。顯然“生命”、“生活”是第一性的，而宇宙的存在是第二性的。真正永恒存在的，不是物質，而是“生命”。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生命是物質的一種運動形式，它是物質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的必然的產物；生活是生物維持它的生命的活動過程，就人類來說，生活就是社會實踐，它包括在一定的

社会發展的歷史条件下的生產斗争階級斗争，科学研究等實踐活动。而梁漱溟却把生物界的生命現象和人类社会的生活混同起来：生命也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生命。把一个莫名其妙的“大生命”神秘化，把它当作創造一切的力量。

梁漱溟不但抹煞人同一般生物（动植物）的界限，甚至也抹煞了生物同無生物的区别，他把一切都給它加上神秘的“生命”或“生活”。他們把整个世界当作一个“大生命”，神秘的生命。他們所謂生命並不需要任何物質基礎，相反地，物質的存在倒是要靠这一超自然的和推动自然發展的力量，宇宙以生命为基础，宇宙靠生命才存在。因此，他們所謂“生命”，乃是反常識、反科学的一种最后創造的力量。

这一派，把个人的心理状态中的感情作用，看作“大生命”的實質，这就是他們所謂“仁”。他們把中國封建社会的倫理关系看作永恒的关系，把这种封建道德叫做真正的“生活”。唯心主义的理学家常說“仁”是“天地之心”，梁漱溟也絕對拥护王陽明的“草木瓦石也有人的良知”的主觀唯心主义的謬說。他們把渾沌的、神秘的、不可言說的“生命”作为世界的根源，这也就是用主觀意識吞沒客觀世界。

把客觀世界当作是具有生命的、有意欲的、有心理活动的神秘的事物，这样的反动学說，在中國陈腐的封建主义文化的垃圾堆中也可以找到不少。上古可以追溯到孟子。最明顯的是北宋时期的程颢和他的門徒們。这一派，曾公开宣揚生命是万物的根源，並在中國哲学史上引起了相当廣泛的毒害影响。

程颢和他的門徒，講“仁”，曾提出一个新的（但是腐朽的）說法。他們說，“仁”就是桃仁、杏仁的“仁”，桃仁、杏仁是桃樹、杏樹的根本，有了桃仁才有桃樹，有了杏仁才有杏樹，因此桃仁和杏仁是桃樹和杏樹存在的前提。他們这一派根据桃、杏的“仁”，進而主觀地給世界找尋根源，他們認為人类的“仁”，乃是天地間無所不包的生命力量。有了“仁”才有人类，才有世界。他們認為

中國的封建社会的倫理秩序，是体现了“仁”，甚至自然界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是体现了“仁”。这一种神秘偉大的力量是“天地的心”，是世界的根源，是事物生長、变化的最后的推动力量。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國，任何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要抬出帝國主义的思想体系替自己撑腰。梁漱溟不僅是一个頑固的复古主义者，而且是維護帝國主义的利益的買办学者。他把封建主义中宣揚“生命”的学說和帝國主义学者柏格森的生命派的学說混在一起。

梁漱溟轉述柏格森的思想說：

“宇宙的本体不是固定的靜体，是‘生命’是‘綿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79頁）

梁漱溟的生命主义，也正是这些反动的生命学說的翻版。他說：

“这一个‘生’字是重要的觀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話。……他（指孔子——作者）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發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滿了生意春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21頁）

这里的“生”，也就是梁漱溟在另外的地方講的“仁”。梁漱溟和其他的封建主义的哲学家一样，認為“仁”不但是社会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共同遵守的規律，也是自然界的規律。他把旧中國人压迫人不合理的秩序解釋为普遍的秩序。

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繼承並發揚了宋代理学的唯心主义傳統及明代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义的学說。王陽明在他的“大学問”一篇文章中充分發揮了神秘的“万物一体”的主觀唯心主义的学說。梁漱溟到处發揮王陽明的“天地万物与人为一体”“草木瓦石也有人的良知”的謬說。他認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大生命，离开了人的良知就沒有客觀世界。他要人不分別彼此，“与人为一体”。

生命主义的世界觀是主觀唯心主义的，在認識論方面，也必然否認認識的來源有客觀物質基礎。他們認為，我們不可能認

識獨立於我們意識之外的客觀世界，只能反觀自己的內心。因為照他看來，根本沒有獨立於人們意識之外的客觀世界。梁漱溟所謂認識“本体”、就是認識“大生命”，而这一大生命是流動的、是“綿延”（他完全同意柏格森的生命主義哲學），這一種神秘的境界，“非感覺理智所能辦，必方生活的直覺才行，直覺時即生活時，渾融為一個，沒有主客觀的，可以稱絕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79頁）這一神秘的大生命，人類不能通過科學的認識的道路去認識它，只有靠不可言說的“生活的直覺”才行。

這一派的哲學，既然否認認識的來源，必然也否認認識的可能。他們把認識看做自己認識自己的過程，所以梁漱溟一再說認識要“無對”（沒有客觀對象的認識），要“反身而誠”“向內用力”。如果說梁漱溟也用認識這一詞，那只是叫人認識“生活”。他的“生活”就是指的他所尊奉的與人民為敵的封建剝削制度秩序下的生活。

科學必須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而生命主義根本否認客觀世界的物質性；科學的規律就是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而生命派却否認有認識客觀世界的可能；科學和理性不可分，而生命主義公開反對理性，認為理性（梁稱理性為理智）根本不能認識客觀世界。梁漱溟以及一切直覺主義學派共同的特點，就在於它公開反對理性，反對科學，反對分析。他們認為說不出所以然的“道理”最有“道理”，只要“心安”就“理得”，一件事情，只要主觀上覺得非做不可，就去做，這種行為就是對的。宋代有一個直覺主義者楊簡經常說“人心自明，人心自靈”。佛教禪宗的和尚常用一種神秘的比喻來宣揚他們的直覺主義的認識論，他們常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就是說，在認識上，真假、是非沒有客觀標準，如果硬要找尋標準，那就是每一個人自己的主觀意識。這種直覺主義必然是神秘主義的。他們反對用科學方法獲得真理的可能，他們不承認由感性到理性認識的唯一科學的認識過程。他們反對有客觀真理。他們認為只要“問心無愧”，就

不怕“伤天害理”，按照本能，不加理性思維的行动就是最“合理”的行动。

在二十世紀，科学昌明的时代，反动的階級为了反对馬克思主义，他們搬用了古代及中古时期那一套陈腐的名詞，並且把它修整得更平滑，企圖掩盖它的反科学、反理性的面貌。梁漱溟在这里抬出他的“理性”，來掩盖他的反理性的实質。他說：

“二十七年我亦还不認識理性，同意克魯泡特金道德出於本能之說，而不同意罗素本能、理智、灵性之分法。及至有悟於理性、理智之必須分开。而后恍然罗素之三分法为不易之論。——罗素所云灵性相当於我所謂理性。”（“中國文化要义”，第 348 頁）

这就是說，在二十七年前他还不懂得利用“理性”这一名詞來騙人。二十七年来在馬克思主义的普遍影响下，越來越多的羣众認清了科学、民主、理性的重要，直觉主义越來越騙不了人，於是梁漱溟就篡夺了進步羣众所相信的“理性”这一有号召力的名詞，給它注入直觉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内容。梁漱溟所謂“理性”是一种心理的状态，是一种感情，而不是經過科学的分析，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認識。他說：

“所謂理性者，要亦不外吾人平靜通达底心理而已。”（“中國文化要义”，第 135 頁）

又說：“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方面曰理性。”（同上，第 138 頁）

“不欺好惡而判別自然明切者是之謂理性。”（同上，第 141 頁）

“理性之取舍不一，而要以無私底感情为中心。”（同上，第 138 頁）

按照梁漱溟的說法，这种“無私底感情”“平靜通达底心理”所產生的神秘的力量是無法估計的。它不僅是“人类的特征”，它还是“推动歷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的唯一力量。（同上，

第 348 頁)

梁漱溟用感情的直覺代替了理性的科學的分析。用主觀的心理狀態代替了判斷是非的客觀標準。用主觀的直覺的好惡(喜歡或不喜歡)代替了檢驗真理的實踐。他們說的“理性”實際上已變成“上帝”的代用品,因為只要憑借“無私的感情”“平靜通達底心理”,居然能夠“推動歷史,支配社會,控制人生”,它不是不可思議的萬能的上帝是甚么?

這一生命主義的反動傳統,在清末漢奸頭子曾國藩的手中也曾經有所發揮。國民黨匪幫的頭子,蔣介石和陳立夫更進一步把這個反動傳統同帝國主義的生命派哲學相結合,創造了反動透頂的“唯生論”。他們認為宇宙發展和社會發展都是由一種神秘的、不可抗的生之力量在推動着。世界的發展是盲目的衝動所造成的,沒有任何規律,只要誠心誠意地信仰這種反動的哲學,就會產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玄幹的力量,就會產生他們所謂“革命”(應當說是反革命)的行動。這些法西斯的匪徒們認為只要盲目行動(他們所謂“力行”),就是實現了生命的原則,就是他們所謂“人生的意義”。法西斯匪徒們說“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他們把人和動物完全等同起來,說“人本是爭生存的動物”,“生來就有一種向上的衝動”。這種原始的動物性的“爭生存”“向上的衝動”被看做世界發展的動力。

梁漱溟恰恰也唱着同樣的調子。他說:“人的生活那里都是有意識的,他同動物一般也是出於本能,衝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 170 頁)。又說,“欲望”“衝動”是“人類行為的源泉”(同上),“人類社會之進化,不外乎是沿着生物進化來底;二者同為宇宙大生命之表現,前者實為后者之繼續。”(“中國文化要義”,第 43 頁)

從以上的例證,我們不难看出,北宋的二程、王陽明、曾國藩、到蔣介石、陳立夫、這一系列的生命主義的哲學,都自己號稱繼承了中國文化。如果叫它做“中國文化”,那就是中國文化中

最反动的封建性的糟粕，而这一反动的生命主义哲学的傳統，恰恰也就是梁漱溟奉为至宝，尊为“中國文化”的“要义”的。

梁漱溟的这些根本的观点，並不只是辞句上和蔣介石、陈立夫的“唯生”哲学的詞句相同，而是精神實質上完全一致。胡適以他的实用主义为蔣介石和帝國主义服务，梁漱溟以他的生命主义哲学为蔣介石和帝國主义服务，这一点也是一样的。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編者按：本文轉載时，曾經作者略加修改）

梁漱溟的“理論”是極端唯心主義的

潘梓年

梁漱溟和胡適一樣，是最反動的一個唯心主義者，是中國革命最狡猾的一個反對者——他不但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就連民主主義革命也反對。

梁漱溟許多年所寫的书是不少的。他所寫的几本書，据他自己說：“是感受中國問題之刺激，切志中國問題之解決，從而根追到其歷史其文化”而寫的，里面所講的都是近四十多年來中國革命問題以及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看法。講的最多的，也就是他所講的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村問題。他自己吹牛說，他所寫的那些議論，都是根据他实际生活中所體驗到的活問題、活材料，而“不是書本知識”，不是偏於頭腦一面的活動，不是什么唯心主義的東西；他不歡迎人家向他宣傳唯物、宣傳革命，說：“我何常不革命？我未常不唯物！”但如果你去看一看他那几本書，就可看到滿紙都是隨便拾來的“書本知識”，而且还是其中的一些無稽之談；即使也有一些他自己的“生活體驗”，那也只是一些極瑣碎、極片面而又被他大大歪曲了的表面現象。根据这样一些所謂“體驗”來大發議論，正是一切反動的唯心主義者共同的手法。一切反動的唯心主義者，正就是抓取一些瑣碎、片面的表面現象而又加以歪曲，來對人說教，淆惑聽聞，使人糾纏在一些迷糊不清的瑣碎現象上而失去追研這些現象后面的事實本質的可能。這就是一切反動的唯心主義者的議論能够對一些青年發生作用、能够在一些知識分子中散佈毒素的惡毒之處。

梁漱溟的理論是非常怪誕的——他自己也在他所寫的“兩

年來我有了那些轉變？”一文（見一九五一年十月五日“光明日報”）中承認自己是“荒唐失敗”了。他荒唐地堅決否認中國社會有階級剝削。更荒唐的是他還認為舊中國兩千年以前就已經沒有了統治階級、沒有了封建、沒有了什麼壓迫。他說，幾千年來中國人“彼此相與之間，松軟溫和，几無所謂壓迫”，“自古既有比任何國民更多之自由。”他甚至否認中國是一個國家，他說，中國人“密於家庭，疏於社會，而几無所謂國家”。講到革命，在他講話開始的時候，也擺起了神氣十足的革命者的架勢，說他對中國革命是如何如何的熱心。但在一路講下去的過程中，左轉一個彎，右轉一個彎，講來講去，講到後來，革命就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他的結論是，中國問題“根本不是對誰革命”的問題，而只是什麼“文化改造”的問題。因為據他說，中國既沒有革命的對象，也沒有革命的動力——隊伍，在中國談革命簡直是不通之論。他這一套議論，真可說是荒唐到了極點。（在他看來，中國既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封建階級——它在兩千年以前就“由於內部軟化分解而解體了”。至於帝國主義，倒確是一個革命對象，但中國人一離開它就立刻支持不住，即使它自己要離開去，中國人也要向它乞求說：“請你還是侵略我吧！”）

但他那套議論竟也自成一家，也算是一種“理論”呢？而且那套“理論”也曾過去發生過不算太小的反動作用呢！這是什麼道理？這主要是因為他那套反動議論正合乎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的需要，是它很好的一个幫兇，因而就獲得這個反動統治的大力支持。梁漱溟自己也曾無恥地公開說過，他如果沒有韓復榘這一類萬惡軍閥的支持就毫無辦法了。其次，當時某些愛國青年和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由於無法受到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思想的教育，熱心救國而又找不到救國之路，於是“病急亂投醫”，有的就投進了這位“江湖醫生”、“走方郎中”的圈套里去了。現在，他的靠山蔣介石反動統治已由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給解決了，逼得他只好自認“荒唐失敗”，余下的是要我們指出梁漱溟理

論的荒誕不經之處。

首先，梁漱溟理論的基本論點，即其理論的出發點，是一個社會的能否發展、向什麼方向發展，以及這個社會的革命危機已否成熟，能否成功等等，要決定於該社會成員的“生活態度”、習慣、精神——一句話，決定於該社會的文化。這是極端唯心主義的、極反動、極錯誤的論點。歷史唯物主義者，根據對社會、對歷史的科學研究，早已肯定：社會的能否發展，革命的是否成熟，是決定於該社會的經濟基礎即生活資料的謀得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情況。文化對社會、對革命只能起促進或障礙、巩固或渙散等輔助作用，不能起決定作用。換句話講，是經濟基礎決定文化，不是文化決定經濟基礎。這一個科學真理，不只早已由馬克思主義導師的科學論著所充分闡明了，而且也已由蘇聯、中國以及許多人民民主國家的革命事業、建設事業的輝煌成就所証實了。無論是誰，只要他是尊重事實的——實事求是的，相信科學的，都沒有辦法不接受這個真理。試問中國人民，如果不是在革命勝利後，首先在生產上、物質生活上有所改善，能夠談到提高中國文化嗎？梁漱溟的所以倒霉，所以“荒唐失敗”，就在於他沒有懂得或抵死不肯接受這個真理。

同時，梁漱溟所談的文化，也只是反動統治階層少數人的文化——早已腐爛了的那一部分文化，而絕不是中國舊文化中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那一部分優秀的文化遺產，更一點也沒有講到許多充分表現出中國人民勤勞、勇敢、富於智慧的那些文物，所講的只是“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就有道而正焉”等等那些偽君子們已說了幾千年的陳言爛調。偽君子們所以死抱住這些陳言爛調不肯放手，並不是他們自己真的要照着做去，而只是想用以欺蒙勞動人民，叫大家安於被剝削被壓迫，不起而反抗，以便於他們的剝削統治好“長治久安”下去。要不然，大家可以去看看梁漱溟自己的生活，看他是否能“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梁漱溟所以要那樣談社會，談革命，談文化，一点也不奇怪，